

回头再看罗荣渠

郝斌

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,在当时的历史系中,乃是旁出一枝,离开了传统,人们私下议论起来,视其为“海派”、说他“赶时髦”的不少。君不见,自打此后,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、由史入论、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,进而稳定下来。

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。他的音容渐渐模糊,另有一些东西却慢慢沉淀下来,随着时光的推移,菁存芜去,轮廓愈见分明。时空的距离有助我们去观察、认识人和事。今天想来,也许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,更能显示罗荣渠的本真。大家聚会来追念他,我觉得,最可珍视的,是他为北大历史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的治史之路;而言及于此,又不能不去追寻当年他那股治学勇气和创新精神。

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。

晚岁的田余庆与林被甸比邻而居,他们常相过从闲聊。这则故事,是田先生亲口对林所讲,而且先后谈过两次;近年,林被甸又向我重复转述过三次。

1988年10月,有一个理论讨论会,由中宣部、中央党校、社科院联合主办。会上颁给史学界两个大奖,乃从此前十年间(1978—1988)全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之中筛选而来。罗荣渠的论文《一元多线历史观》,是为得奖作品之一。这在当时的史学界中颇有震动,对北大历史系来说,也是一件殊荣。颁给罗荣渠的奖牌送到历史系,时任系主任的田余庆,手捧奖牌,登上四楼,亲自送到罗舍。熟悉田余庆的人都知道,在他心目之中,这类事情大抵属于俗务,平日他本不屑一为,这回何以要爬上四楼、亲自呈送在罗荣渠的面前呢?——果然,其中有戏。

他们互道问候之后,田开言对罗说道:此番获奖,诚然可喜可贺,同时我有一言相奉:事情不妨可以到此为止了,见好就收。以我兄的才力,多做一点学问上的研究,日后当大有为。

田的一番话,听起来有点不近情理,像是在吊唁贺丧,其实不然。在田说来,这是肺腑之言,而且,也只有他们两位之间才可以这样过话。为什么呢?一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。田、罗二人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史学系同窗同年,原有一层少年情谊。北京解放前夕,田参加学运,一次情况紧急,他躲进罗荣渠的房间,才得以逃过搜捕。后

来他们同在历史系执教,各忙自己的事,交往虽然不密,情谊深埋心中。但对罗近年所走的路,见仁见智,田早有看法,骨鲠在喉,不吐不义。再者,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。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,在当时的历史系中,乃是旁出一枝,离开了传统,人们私下议论起来,视其为“海派”、说他“赶时髦”的不少。作为老同学,田不去直言一回,还指望谁去说这种不中听的话呢?!眼前是个进言的机会,错过这个村,就怕没这个店了。第三,田了解罗的功底,只要他肯回头,传统的治学之路,对他来说驾轻就熟,可以计日程功。1963年,罗的《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》、1983年的《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》先后发表,两篇文章颠覆了一说:中国人发现美洲。“中国人发现美洲”,原是一个由洋人提出、而后受到多位中国学界大佬认同称赞、更为坊间多年所乐道、还牵扯上民族情感的一个敏感话题,不想在罗的严整论证面前,瞬间化为泡影。时任考古所所长、主持《考古》杂志的夏鼐先生读到《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》,先后曾有七信致罗,称道罗的文章“所言极是”、“立论严谨正确”。夏鼐当时正在编排次年出版的《考古》国庆专号,表示愿意重刊此文,“借重大作,以光篇幅”;同时指出罗文白璧微瑕,盼罗有所润补,以求尽美。罗的修订稿于是再次刊登于《考古》1984年国庆专号。罗关于美洲发现的观点,从此遂为学界公认而不疑。夏鼐的严谨是出了名的,他对罗文欣赏如此,罗的功底,由此可见。还有,罗初到北大的时候,一度有意跟随向达先生去专攻中西交通史,这也是他自己掂量过后的一种考虑,他有语言和考据方面的功夫,自认中西两面可以兼顾。在历史系罗的同辈人中,能够贯通中西、或者有心去贯通中西的人,其时已经寥寥。一句话,田、罗二人,走过的是一样的路,才气相若,抱负相同,在田看来,你何必弃史就论,去钻那个窄胡同呢!——田向罗所进一言,不过数语,笔



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,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行、并进的路子。罗荣渠是另一条路数的开创人。



者在这里却啰嗦半天。时隔三十年了,不揣愚陋,对田的话我大胆地做出如上一番解读,就正于知情故旧。

田的话可谓单刀直入,罗的回应如何呢?罗的回答,简单到不能再简。他说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!”

田、罗二人的一番对话,大抵如上,时在公元1988年10月某日,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关村46楼407室罗宅。我觉得,这段对话或许值得记入北大历史系的系史之中。君不见,自打此后,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、由史入论、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,进而稳定下来。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,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行、并进的路子。罗是另一条路数的开创人。

在我们历史系,传统的治学之路行之有年,深而且厚,但是没有保守的习气。上个世纪50年代,先有周一良先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,继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片天地,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。他们创新,凭的都是传统的功底。传统与创新,其实环环相扣。没有功底,何谈创新?不过,这三者说

学;那么,这两家的动静又是如何呢?此时此刻,他们两家寂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社会学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科的一次大调整中,被视为细碎杂拼之学,不能自成体系,从学科目录之中被一笔勾销,干脆连根拔除了。大学之内,再无此一门,社会学系的教师、学生星散在各相近学科的屋檐之下安身。荒芜三十年之后,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,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建。费孝通的弟子袁方,是拟聘的系主任,还没有到校;副系主任、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受命筹划一切。学生宿舍26楼一层挤出两个房间,给他们做了办公室。彼时,遗留“工事”依旧装点校园,遗痕未消,潘乃穆从房中扫出了与窗齐平的灰土,才得进入。50多岁的人了,她登上三轮板车,借来几张旧桌、几把旧椅。桌椅放稳,询问报名的学生已经上门。这是社会学。那么经济学呢?经济学界这个时候正陷于“市场?计划?”的争论之中,谁有心思来打理这个边缘上的“现代化”?这个时

(下转3版) ➔

策划:

文汇报理评部

执行编辑:

李纯一 licy@whb.cn

陈韶旭 csx@whb.cn

封面编辑:

陈韶旭 csx@whb.cn

封面图片:

水陆攻战狩猎纹铜壶纹样,战国,陕西凤翔县博物馆藏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关注文汇报

